

论萧红形象的历史变异

王金茹^{1,2},王学谦¹

(1.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2. 吉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吉林四平 136000)

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与她的人生经历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个人生活经历曲折而又坎坷,也不时为人所诟病。萧红生前逝后的遭遇既有时代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个体的特殊性,这种现象的背后,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社会话语等多种因素,萧红形象也因此发生着历史变异。

关键词:社会话语变迁;作家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3)01-0077-04

作家总是力求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一系列经典形象,以此来实现他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作家都希望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理想及文学艺术等的体悟与思考,读者在不了解作家生平的情况下大多是通过阅读作家的作品来想像与建构自己心目中的作家形象。作家与社会、作家与读者的交流更多的应该是通过作品,这是作家这一社会职业所特有的一种自我形象塑造路径。但在现实社会环境中,我们发现作家形象建构与其作品创作的关系并未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有时甚至因为某些社会或政治因素,使作家与作品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以女作家萧红为例,她的作品从出现在文坛上开始,就受到来自不同读者的关注,对其评价也是各有不同,萧红的作家形象也是几经变化,再加上萧红本人身世的坎坷,情路的曲折,以及与其交往人物的特殊性,都使得萧红的作家形象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冉冉兴起的文学新星

萧红走上文坛,与其个人的天赋禀性有关,与其多舛的个人命运有关,更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环境有关。说到萧红的文学创作,多数人都想到萧军当年英雄救美及二萧后来扬名上海滩的文坛佳话。

1. 机缘巧合 两萧相遇

当年萧红被困哈尔滨道外区正阳十六道街的东

兴顺旅馆走投无路之际,给报馆写信求助,正是这一次落难让她与萧军相识相恋,两位文学爱好者从此走上一条共同的文学追求之路。在哈尔滨生活时期的萧红尽管没有太突出的表现,但在那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当中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作家形象,最有力的证明是她与萧军两人自费出版了合集《跋涉》,并且反响不错。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文评家对她的作品进行品评,但在同行的眼中,尤其是在“牵牛坊”那些当时哈市的文人眼中,萧红的文学才华已经被认可与认同了。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文学女青年后来竟成为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包括她的爱人萧军也可能没有料到。因为尽管大家觉得萧红有写作的天赋,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觉得作为女人,她就注定不会有大出息,用现代管理学理论来说就是,“个体社会地位的高下必须根据知识多少而不是基于裙带关系和财产多寡”。^[1]作为那个时代的女人,能读书识字同时再有点儿思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女人最大的职责是为丈夫做饭整理家务,做好后勤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下,萧红的社会形象实际上只是限于文学女青年这一形象框架内。

2. 风云际会 走上文坛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段充满纷争与动荡的岁月,尤其是东北,日军的铁蹄下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跋涉》这一小册子的进步性而受到当局“关注”的二萧,不得已计划着南

收稿日期:2012-04-17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129);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015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C048)

作者简介:王金茹(1972—),女,吉林农安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逃。从哈尔滨到青岛,再从青岛到上海,这两位来自东北的流亡青年在上海得到了文学巨匠鲁迅的关心与扶持,这是他们与鲁迅的缘分,更是鲁迅作为文学长者对后辈的关爱与慧眼识才。在鲁迅的关照与提携下,二萧的《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分别亮相上海文坛,由此,萧红作为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

《生死场》的出版,让萧红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海滩一众文人的眼中,大家惊叹于这位年仅23岁的东北姑娘怎能有如此的笔力与才华,包括鲁迅和胡风,看看鲁迅为《生死场》做的序和胡风为之写的读后记就可知一二。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写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2]54}不愧是一代文学巨匠,寥寥几笔,便将小说的精髓抓住,这段文字后来也便成为《生死场》标志性的注解,瞬时风行文坛。而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所进行的评析,要比鲁迅详细和全面得多,胡风不仅指出了“越轨”笔致的表现——“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2]267}而且胡风还指出了《生死场》的弱点:一是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二是人物描写方面个性不凸出,三是语言的锤炼不够。

3. 名师提携 才华尽展

由于鲁迅的肯定与提携,萧红在上海文坛是格外受瞩目的,上海文坛不同于哈尔滨,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像聂绀弩、胡风、茅盾这些中国文坛响当当的人物都能对萧红的才能青睐有加实在是不容易的,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鲁迅的慧眼识才。三十年代的海文坛情形非常复杂,各种势力与派别斗争激烈,特别是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民族矛盾激化,随着国土沦陷区的扩大,民众的爱国情绪高涨,萧红和萧军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在上海文坛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这和当时的全面抗战话语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萧红此时作为风头正劲的女作家,连鲁迅在会见史沫特莱时都说萧红有取代丁玲之后劲,可见“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3]一说并非溢美之词,抗日女作家形象也由此深入人心。

二、与外界生活渐行渐远的青年女作家

随着声名的日渐提高,二萧的感情生活却发生了一串串不和谐的音符,从萧红出走日本到后来的避逃北平,无不是女作家为了减轻感情方面的痛苦,同时也是为自己争得一份从容安静的写作环境所作的努力。两个骄傲的人很难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正如萧军当年对聂绀弩所说:“她(萧红)单纯、醇厚、

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4]136}也许正因为彼此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萧红最终决定和萧军分开而和端木走到了一起。

1. 为情所困 为世所病

萧红也许没有想到和萧军分手与端木结合会在朋友们中间产生那样大的反响,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她的生活与情绪,更使得她的个人形象大大受损。在男权社会中,男人感情出轨或是风流可以被理解,而女人在婚姻之外有了恋情则要受到世俗的审判与鄙薄,更何况女人外遇的对象是大家都不看好或者不喜欢的男性。萧红的错误不在于离开萧军,而在于离开萧军却选择了端木,端木的人品与行为做派很不得当时那些文人作家们的认可,正如聂绀弩暗示萧红:“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记得爱罗先河童话里的那句话:‘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4]136}聂一再暗示萧红不要与端木在一起,因为端木实在不是与萧红般配的理想男人。事实上,萧红选择了端木后就渐渐远离了原来那帮朋友,朋友们也不再情愿与她来往,这让她感到孤独与苦闷,唯一能解脱的办法就是写作,在与端木生活的四年中,萧红创作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和《小城三月》等一系列名篇,将自己的文学生涯推向了高峰,而身体也在极度的透支中走向了毁灭。

2. 抗争命运 孤军奋战

这一时期的萧红,尽管文名还在,但形象上已没有在上海时那样辉煌,也许是有鲁迅在的日子大家因为鲁迅的推崇而十分关注她,鲁迅去世后能为她遮挡风雨的萧军也离她而去,所以她那毫无处世经验的个性让她无法获得更多的支持与理解,反而是更多的误解与不理解。她的朋友们时常为她在处理感情问题时的做法发出这样那样的感慨,比如绿川英子、池田幸子,还有胡风的夫人梅志、丁玲等人。在这些人眼中,萧红过于依顺萧军,萧军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而当萧红离开萧军和端木在一起时,他们又觉得萧红选错了对象,遇人不淑,这又增加了萧红悲剧人生的悲怆色彩。

3. 红颜薄命 万千嗟叹

萧红的生命在31岁时画上了句号,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女作家就这样英年早逝了。萧红的死在原来那帮朋友的心中激起了千层巨浪,他们把所有的悲伤与惋惜之情都化成了对端木的怨怼,认为是端木没有照顾好萧红,令她的身体如此不堪一击,其实在这一点上端木也有些冤枉,作为一介书生,他根本没有萧军的霸气与担当,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他身上可能更明显,相反,萧红身上的豪爽与硬朗倒成了

他的一个支撑,再加上战乱与生活的奔波,让他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萧红和萧红的健康状况。萧红去世后,朋友们写下了大量怀念萧红的文章,回忆她生前的点点滴滴,成为研究萧红生平与创作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也正是这些文章让人们又想起了那个曾经名噪一时的东北女作家。

三、被误读与被遗忘的“倒退作家”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胶着期,全国上下都处在抗日的情绪中,大部分作家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而很少能算文学创作的。(葛浩文语)正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下,萧红的《呼兰河传》诞生了。

1. 不合时宜的写作

《呼兰河传》的出版没有给萧红带来声名,却招来批评界的责难。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茅盾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言,以茅盾的才力当然会发现小说的独特之处,他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5]⁷⁰⁴如此评价还是极为恰切传神的,但茅盾更多的是指出此文的不足:“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5]⁷⁰⁴字里行间茅盾对萧红创作主题上的遗憾溢于言表,认为这部作品是萧红苦闷而寂寞情绪的象征,与1940年前后这样的“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多少有点不可解”。茅盾当时是文学界的著名人物,他的评断可谓举足轻重,在他的话语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囿于个人情感痛苦小圈子里而不能自拔的女作家形象,这与当年写作《生死场》的那位豪气干云,意气风发的女作家判若两人,可以这样推理,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茅盾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因而直接导致了其后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6]

2. 不被认可的作家

1945年石怀池写了一篇《论萧红》,^[7]可以说这是当时政治语境下的颇具代表性的评论。在石文中,评论者以一种政治评判的语调评述了萧红的一生和她的主要作品,认为萧红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斗争”的失败者,“她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融化成一个整体”,“一再陷于感情的泥沼里”,石文将《生死场》作为萧红的最佳作品,而认为萧红后来的作品无力摆脱个人情感和病痛的束缚,“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泥沼里”,是“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证明。^[8]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石怀池先生完全是按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思维在对一位重

视内心感受、忠于自己艺术感觉的作家所作的武断式批评,这也是建国后长期统治文学评论界的一种语调。从40年代延续下来的对萧红的论断一直持续到新时期,萧红的作家形象也便被固定在“脱离大众”、“走下坡路”、“走不出个人感情泥沼”、“狭窄”等这样的话语中,其后期作品也由此一直处于被忽视、被误解中。

3. “倒退”背后的反思

萧红作品之所以不被认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萧红在创作中所秉持的是鲁迅的思路,坚定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9]而这种创作思想不仅与胡风等人相左,更与四十年代以后的时代主潮脱节。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批评界主要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和一种话语。以童庆炳先生的归纳来看就是“主导的倾向——文艺从属于政治”。^[10]强调文艺的方向必须是政治性的,如: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1]在这些理论话语前提下,一切与政治离得稍远的作品都会被搁置或者冷落,萧红的作品自然难以融入时代的大潮,相应的,其作家形象也便大打折扣了。

四、重放光彩的“文学洛神”

当历史的车轮碾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界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一些在主流文学史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重新得到了关注与解读,萧红也在其中。

1. “萧红热”的历史动因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反思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文学理论从此进入转型与发展时期。这个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10]正是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萧红热”出现了。

2. “萧红热”的丰富表征

在有关萧红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女作家形象。仅从有些研究成果的题目来看就可见一二,如李小江《萧红:大智勇者的探寻》(分别收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浮出历史地表》)、刘思谦《萧红:漂泊岁月寂寞路》、张国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

诗——评〈呼兰河传〉》、皇甫晓涛《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议》、季红真《叛逆者的不归路》、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等，这一系列的带有评价色彩的标题无异于是为萧红一次次塑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作品中去发现萧红，理解萧红，如季红真先生的《对着人类的愚昧——序〈萧红作品集〉》一文认为萧红秉持了鲁迅的启蒙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了开启民智的热情，是一位有着极大的革命热情的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作家。随着研究的深入，季先生又从萧红作品的基本叙事视角发现了一幅“现代性劫掠中的历史图景”，由此萧红便又成为具有现代性意识的一位女作家。而在学者林贤治的眼中，萧红最显著的特点是平民作家，底层叙事，是一位平民代言人，她用自己的如花妙笔为读者展现的却是下层民众深刻的苦难，而她自己更是历经苦难生活，是一生都在苦难生活中挣扎与奋斗的行吟作家。在钱理群眼中，萧红则是怀着忧国忧民思想，试图通过文学来“改造民族灵魂”，从而实现鲁迅遗志的天才女作家。他说萧红与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父与女”^[12]也有研究者认为萧红是一位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意识的作家，她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彰显着东北地域文化的色彩，为自己的家乡立传，她是一位乡情意识很强的女作家，年轻时叛逆，中年时开始反思，由此写出了《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这样的情感丰沛的优秀作品。更有人通过作品探析出她内心中深刻而隐秘的集体无意识与母神崇拜心理，从文化深层原因来解读萧红及其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萧红。^[13]但也有人对萧红的创作与个人生平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萧红的人生选择是“在生存需求与浪漫爱情之间”的产物，而非别人眼中那样高大与纯情，这一说法在众多的正向评价中作为一家之言而存在着。^[14]

3. 千人千面塑“萧红”

如此种种评说，为读者建构了一个更加立体、丰满的萧红，但还不能确定就是真实的萧红。真实的萧红永远随着那个主体的萧红的消失而变得神秘莫测，但是在人们不断的阐释与建构中却又有一位渐渐明晰鲜活的女作家形象诞生了，而这一切均得益于新时期以来这种开放的、多元的、民主的文学评论话语环境，让研究者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与角度去关注这位女作家，尽量还原一位真实立体的女作家形象，可见社会话语环境对作家形象的建构之影响多么巨大。

历史地看一切问题，也就是洪子诚所说的“回

到历史情境”之中，将历史还给历史，每一阶段的萧红研究都是深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的，而社会话语作为一种显在的存在对研究者的影响至关重要。其实，除了上面论述的内容之外，作家自己在创作中也一直在努力自我建构。作为语言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之间的张力，为语言虚构出现实的自我敞开了广阔的空间。^[15]他们希望通过作品与世界对话，但他们可能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作品有时并不被大众接受，或者不被主流话语认可，那么他们创作的成果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便发生了纠结，其作家形象的建构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往往推给世人的是一个复杂的、暧昧的、也是立体的作家形象，而这个作家形象又与真实的作家相差多远呢？答案并不能惟一，不同的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背景，所得到的结论又多是不同的，但其内在规律有迹可循。

参考文献：

- [1] 左雪松，夏道玉. 女性时代风貌与“剩女”择偶模式：基于传统择偶模式的社会学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4)：51-54.
- [2] 萧红. 萧红全集[M]. 哈尔滨：哈尔滨人民出版社，1991.
- [3]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45.
- [4] 聂绀弩. 沉吟[M]. 上海：上海文化供应社，1948.
- [5] 茅盾. 呼兰河传·序[M]. 哈尔滨：哈尔滨人民出版社，1991.
- [6] 黄晓娟. “雨中芭蕉”：萧红创作论[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
- [7] 石怀池. 论萧红[C]//石怀池. 石怀池文学论文集. 上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5：98.
- [8] 李向辉. 《生死场》的现代书写：萧红新论[D]. 兰州：兰州大学文学院，2007.
- [9] 胡风，端木. 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J]. 七月，1938(3)：45-48.
- [10] 童庆炳. 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J]. 文艺争鸣，2009(9)：8-32.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6.
- [12] 钱理群. “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J]. 十月，1982(1)：56-59.
- [13] 王金茹. 论“女神崇拜”在萧红小说中的变形[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3)：87-90.
- [14] 郝庆军. 在生存需求与浪漫爱情之间：对萧红与萧军及端木蕻良关系的几点考证[J]. 甘肃社会科学，2005(5)：148-153.
- [15] 张艳萍. 《家庭与世界》：语言可以虚构出现实的范例[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1)：81-84.